

TAFE 学院校企合作发展研究

高雪莹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 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 TAFE 学院校企合作模式, 分析澳大利亚 TAFE 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的动因, 梳理其发展历程。以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TAFE 学院为例总结其校企合作模式, 总结澳大利亚 TAFE 学院校企合作的实践成果和发展优势, 深化对校企合作的理解, 汲取经验, 丰富我国的校企合作实践道路。

关键词: 澳大利亚; TAFE 学院; 校企合作

DOI: 10.69979/3029-2735.25.11.085

1 TAFE 学院实施校企合作的动因

职业教育本质上是政府和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及共享成果的一个过程, 因而政府、行业和企业、社会组织、劳动力市场在其中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能。

推动 TAFE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以下简称为 TAFE) 学院实施校企合作的成因, 其一, 是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格、监督机制、职业资格制度等进行约束和限制。其二, 是职业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目的是使个体为就职做好准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提高和社会转型^[1]。其三, 随着市场变革发展和行业开发能力标准的引入, 行业需求获得重视, 行业标准认证成为了 TAFE 学院的办学标准之一, 并为校企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

2 TAFE 学院的校企合作模式

在澳大利亚, 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多环节共同运作模式贯穿始终。校企合中, 行业、企业和 TAFE 学院之间所筑成的是, 相互依赖、彼此支持的发展格局。本文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 对澳大利亚 TAFE 校企合作形式进行梳理。

2.1 虚拟实习

残疾人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补充往往被忽视, 基于这一现实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于 2010 年推出残疾人就业计划, 为其提就业岗位安置、专业实践等支持服务^[2]。2023 年 3 月, 沃尔沃斯推出的迷你生鲜食品店在新南威尔士州 TAFE 学院洛夫图斯校区成功开业^[3]。该商店将帮助残疾人在无障碍和安全的学习空间中获得方便随时

就业的技能, 增加他们通往终身学习职业道路的机会。同时, 该 TAFE 学院提供生鲜食品课程, 学生可以在模拟的零售环境中建立信心并学习销售要点、接收和处理库存以及与客户沟通等方面的实用技能。除接受上述实践培训外, 学生需完成专业课程学习以获得国家认可的零售 II 级证书课程, 并与雇主联系, 从虚拟场所实习过渡到实际工作场所。

2.2 个性化的校企合作项目——工作场所培训课程

在终身教育的理念的催动下, TAFE 学院与企业间合作项目也开始在其他培训领域蔓发生长。新南威尔士 TAFE 所提供的工作场所培训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 会与特定的企业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帮助填补其业务中的技能差距。

巴兰加罗地区 (Barangaroo) 最初是一片工业性质的棕地, 2003 年新南威尔士政府选址于此, 开展城市更新项目^[4]。2012 年, 联实集团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和新南威尔士 TAFE 合作开展对一期项目南巴兰加罗片区的建设。作为澳大利亚第一个目标碳中和的超高层综合体项目, 且基于联实集团的价值诉求, 新南威尔士 TAFE 为其计划了从学徒到成熟的劳动力, 聘用具有技术专长的培训员; 打造绿色技能劳动力队伍, 员工学习并获得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可持续供水系统和废物回收方面的能力。同时, 提供灵活、有针对性且切合实际的现场培训, 包括基础技能环境、专业的语言等。通过合作, 有近 11000 名工人获得了 20462 项认证的培训成果, 范围从技能集到高级文凭, 二者合作为大量个人实现了现

实生活的改变，对澳大利亚建筑业影响轩遽。

3 TAFE 学院校企合作的保障

TAFE 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转，得益于其在质量保障上的相对完善。澳大利亚政府、行业和企业通过专门的机构管理、法律、拨款和严格的质量评估来保障 TAFE 学院的教育质量和校企合作的持续推进。

3.1 设置专业机构管理

联邦教育、科学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以下简称为 DEST）肩负着对教育、培训的政策咨询，国家资金的分配，以及国家对教育的战略规划。而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以下简称为 ANTA）作为国家授权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是依据不同的发展时段和要旨，制定培训政策，制定和完善国家培训框架；在资助款项的分配上，对联邦政府的培训拨款进行后续的妥善分流^[5]。行业培训咨询机构间或会有意识的逐级反馈建议，代表行业的想法。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委员会（Australia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以下简称为 AUQA）则代为传达政府、业界和社会的利益诉求，通过国家质量监管系统，对高等院校进行公正及严格精确的质量检查，并及时将审核结果向社会大众公示^[6]。

作为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有 8 个行政区域，即六州、两领地。《宪法》明确规定，各州、领地政府是各自所辖区域内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责任方，因此，在相关法律制定上，各州、领地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性及话语权。各行政区域对 TAFE 学院不直接管理，主要通过赋权的教育管理行政单位完成具体的操作，即教育培训部。该部门负责对各地职教培训实施总体的规划管理，聚焦政策修订和职教发展等；确保教育条律实施；颁发和授予学历证书；综合考虑辖区内实际情况，筹措经费、处理日常教务等。此外，在联邦及各州、领地共分布有 11 个行业技能委员会（Industry Skills Councils，以下简称为 ISC），其将行业和企业的人力储备需求和发展信息汇总起来；并在政、企、校三方间力行沟通，通过信息反馈改善政府决策^[7]。

3.2 建立经费筹措机制

职业教育的正常运转与发展，由各级政府作为主要资助源头。职教经费总额中，联邦政府的投入至少占据五分之一，州、领地政府为半数左右^[8]。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会通过购买服务直接赠款或向企业投资。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资金的投入数额一直非常可观，根据 NCVER 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政府在 2019–2022 年共计投入 412.48 亿澳元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校企合作的发展，且投资数额在逐年递增，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与信心。除政府外，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经费补充力量。各业界十分看好职业教育发展并欣然为其发展慷慨解囊，政府也一直致力于鼓舞行业、企业落实对 TAFE 学院资金的扶持力度。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在职业教育总的经费投入中行业投资占比就达到了 45% 以上，近年来，更是每年以不同的形式拨款 44 亿澳元以上^[9]。具体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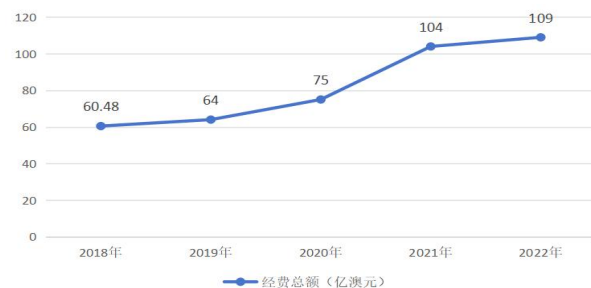


图 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变化趋势（2018–2022）

3.3 筑牢政策、法律保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并持续完善的一系列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使得职业教育行政和管理机构在执行监督和管理任务的过程中有了参考依据，推动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逐步迈向科学规范的发展道路。

在经费筹集上，《学校资助法》《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法》《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等为 TAFE 学院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职业教育教师遴选上，《教师法》的颁布对教师的选择、培训和权利义务等均有所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上，《培训保障法》的颁布规定了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抽拨经费用于员工培训；在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上，《义务教育和培训后青年的参与》，保证了参培人数，提高了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详尽的法律、法规规范了 TAFE 学院日

常的教学实践,对管理做出了标准化要求,为校企间的结合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学院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靠山。

4 TAFE 学院校企合作模式的借鉴与展望

站在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由外延式转向了内涵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演变为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新发展态势^[10]。对技术人才的高标准、新要求,校企合作成为现如今高职院校办学的常见模式。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开展 TAFE 教育和校企合作成果较为成熟的国家,因其在人才培养上具有高质量、高效率,因而在世界各国中享有一定盛誉。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两国有着莫大差异,但可求同存异,即两国皆是由政府扮演校企合作的关键角色。此外,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均历经了由企业参与度不高再到企业主动作为而后形成深度合作的良好局面这一发展轨迹。常言道“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借鉴澳大利亚校企合作的优质经验,尤其是其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对建立起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的校企合作运行模式颇有助益。将有助于弥补人才缺口,推动我国职教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良性互动和链接。

参考文献

- [1]孙翠香.反思与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本质规定性[J].职教发展研究,2023(03):1-11.
- [2]Buys N,Matthews L R,Randall C.Contemporary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n Austr-alia[J].Di

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2015,37(9):820-824.

[3]tafensw.edu.au.Mini Woolies launches new supermarket experience at TAFE NSW campus in Loftus[EB/OL].(2023-03-28)[2024-02-26].<https://www.tafensw.edu.au/documents/60140/1074442176/TAFE-NSW-Mini-Woolies-media-release-280323.pdf>.

[4]tafensw.edu.au.LENLEASE CASE STUDY[EB/OL].(2018-03)[2024-02-26].<https://www.tafensw.edu.au/documents/60140/86282/LendLease+Case+Study.pdf/90025831-6534-93ea-a186-70a98dc38b5c>.

[5]张桐.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嬗变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职教通讯,2017(34):46-50.

[6]刘琳.澳英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初探[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5):99-101.

[7]吕红.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课程质量保障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49,51,65.

[8]杨红荃,夏雪薇.比较视野中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研究[J].职教论坛,2017(34):65-73.

[9]梁帅,吴雪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9,(05):97-103.

[10]雷小波,李可欣,余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基于61份国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5(05):17-25.

作者简介:高雪莹(1997)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硕士研究生,单位:河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